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历史著作史

下卷

第四分册

〔美〕J. W. 汤普森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历史著作史

下卷

十八及十九世纪

第四分册

〔美〕J.W. 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活 校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著作史. 下卷: 全两册, 十八及十九世纪/(美) J. W. 汤普森著; 孙秉莹, 谢德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分科本. 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333-3

I. ①历… II. ①J… ②孙… ③谢… III. ①史学史—世界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656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历史著作史

下卷

十八及十九世纪

(全两册)

[美] J. W. 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333-3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4%

定价: 142.00 元

第九编

论述各种制度的史家

第五十一章 法国 19 世纪的 制度史家

1895 年英国历史家 J. H. 朗德说,前一代的工作是解释编年史,他自己这个时代的工作则是以批判地利用特许状和其他文献资料的办法补充、修正并扩大记事资料的证据。原先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只是偶然的事,因为在 19 世纪最后那几十年以前,这类文献印行极少,只有德国例外。由于特许状和其他一切文献都是出自政府、教会或其他机关,所以这类资料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各种制度的。

19 世纪前半叶,许多德国史学家就对制度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是这个领域的开路先锋。这种不平常的兴趣的产生有几个原因:首先,法国大革命已破坏或废除了欧洲最古老、最伟大的一些制度,这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再者,各种制度都是极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制度史则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根基。制度不是理论的产物,而是在习惯、风俗、传统、思想、兴趣、法律、宗教等方面的经验的凝结。这些制度作为某一特定时代的公共习惯、风俗和思想,它们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特色。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制度绝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成长起来的。它们是历史上一种最耐久的东西。它们一旦失效,就变成过时的东西,只能作为过去人类



生活的陈腐模式存在。研究这些过时的制度仅仅是一种考古的爱好,历史上的古生物学。往往是其精神和机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文字遗留下来。^① 制度史学者,就像古生物学者那样,有时也能够从残存的遗物中把过去某种制度复制出来,比如古代东方的文明的相当大的部分就是以古代陶器残片为根据重新描绘出来的。

360

19 世纪出版的论述制度上种种问题的书籍和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特别是在“道地的”德国就更多了。其中有一个题目比任何其他题目都更引人注目,即封建主义的起源和形成。^② 这个主题里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究竟是哪种特定的制度形成了所谓的封建主义的“胚芽”? 另一个是:这个基本的内核是来自罗马人,还是来自日耳曼人? 这个争论首先在德国出现,但很快就扩展到法国,后来民族情感使德国学者(只有两位例外)联合起来,拥护日耳曼起源说,即封建主义起源于德国;而法国学者则全体一致地主张作为一种制度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起源于罗马人。“日耳曼派”和“罗马派”这两个对立学派浪费了数量极其巨大的纸和墨。民族偏见有时歪曲了史实,同时,在激烈的争论中,事实上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证据,甚至是离题甚远的,都受到细致的批判地

① “通过时间缓慢而无声的变幻,制度改变了;但是……把它们标明出来的那些字则是不朽的。因而我们就往往作出多少是无意识的假定,认为同一个字在过去时代所指的东西也就是它现在所指的。而实际上,我们必须把我们在古代文献中遇到的每个名字当作完全和它偶然保留到现在这件事当成截然不同的东西看待。”见爱德温·哈赤,《早期基督教会的组织》(第2版,伦敦,1882年),第15页。

② 最近的谈论,见亚尔丰司·道普斯赤《欧洲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从恺撒到查理大帝时期》(第2版,维也纳,1923—1924年,两卷),M. G. 比尔德和纳丁·马歇尔译成英文,书名是《欧洲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伦敦,1937年)。特别参看第1,9两章。



审查。

在柏林学派成员提出封建主义起源这个问题以前,18 世纪占优势的普遍意见认为封建主义起源于罗马。杜波神父^①就是这样主张的。难道法国人不是一个“拉丁系”民族么?中世纪法国的封建主义难道不就是封建主义的典型么?伯勒修(1728—1798 年)又把这个学说神圣化,他在罗马的庄园(laeti)中发现了封建主义的胚胎。只有孟德斯鸠一个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说古代日耳曼人的民众会议(comitatus)是封建关系的原始胚胎。

起初,甚至在德国,罗马学派在许多事情上也是一意孤行的。《中世纪罗马法史》的作者伟大的萨焚宜主张罗马起源论,但他并不是法国论点的恭顺追随者。他是第一位强调罗马隶农制在封建制度发展上有重要意义的人。^②爱喜浑^③则根据他对早期日耳曼法律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封建制度中必定有比至今人们料想的更多的日耳曼因素,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展开。彻底研究封建制度中日耳曼因素问题的第一位学者是惠芝^④,他把孟德斯鸠关于日耳曼民众会议的意见扩大了,但并没把这个思想发展到足够的程度。惠芝认为墨洛温国家是真正的政治形式,但在民众会议里却只发现封建因素幼芽,再也没别的了;而后来的研究却表明墨



① 本卷原书第 55—56 页。——译者

② 《法学史杂志》,第 6 卷(1828 年),第 273 页以后。关于隶农制,参看 M. I.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隶农制史研究》(莱比锡,1910 年);浮斯退尔·得·库朗日,《几个历史问题的研究》(第 2 版,巴黎,1894 年),第 1 章,“罗马隶农制”,第 3—186 页。并参看论文“隶农制”见保来-威苏瓦,《真实百科全书》。

③ 本卷原书第 159 页。——译者

④ 本卷原书第 190—192 页。——译者

洛温政府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而且,惠芝没能估计到财产因素、即土地在墨洛温封建制度当中的重要意义。

在解释封建制度发展问题上,在慕尼黑人保罗·罗特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出版后才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三部书是《采邑史》(*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1850年),《封建制与小诸侯联盟》(*Feudalität und Unterthanenverband*)(1863年),《卡尔·马特尔诸子时期教会财产的还俗》(*Die Säkularisation des Kirchengutes durch die Söhne Karl Martells*)(1874年)。罗特主张:罗马的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中占压倒优势,他争辩说,不动产(土地)的来源是在封建政权下找到的,不过,证明这一点是后来浮斯退尔·得·库朗日才办到的。他断言墨洛温国家是罗马式的;只有国王的侍卫制度除外,他认为这个制度可能是民众会议产生的。他相信,王室领地就像真正私有财产那样被据为己有,采邑里没这种东西,就像在罗马帝国统治下那样,墨洛温时代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仍然是公法而不是私人契约。按照罗特的说法,封建制度的主体是在卡尔·马特尔把教会土地还俗并作为军事封地进行分配这件事上正式开始的。罗特认为,封建制度来自三种关系:(一)国王侍卫制度,(二)封地,(三)领主制或小自由人臣服大的自由人,即后来大领主和小领主(领主和附庸)的胚胎。墨洛温时代只存在第一种关系。^①

就在这些年里,惠芝在《论采地制的开端》(*Ueber die Anfänge der Vassalität*)(1856年)和《封建制度的肇始》(1865年)这两部书中

^① 《封建制与小诸侯联盟》(魏玛,1863年),第205页。



把他的看法扩展了,还把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澄清了。惠芝所持立场和罗特的有一部分一致,有一部分和日耳曼派一致。^①

在这期间,所有法国史学家,对德国学术界在封建起源这个问题上进行的工作继续无动于衷,甚至毫无所知。只有基佐一人例外。但基佐的兴趣分散在史学过多的领域,而且过分关心政治,不成其为透辟的学者。他对封建制度史的研究只限于 1829 至 30 那一学年里他发表论述《法国文明史》的那些著名的演说的時候。^② 基佐在这一系列讲演的第 2 类和第 3 篇中曾严厉批判了日耳曼学派的方法和成见,但他没看到自己也是满肚子偏见。J. M. 勒于埃鲁(1807—1843 年)的:《公元 615 年敕令以前的墨洛温制度和墨洛温政府的历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érovingiens et du gouvernement des Mérovingiens jusqu'à l'édit de 615*)(1842 年)和《加洛林王朝的制度和统治中》(1843

362



久。他编辑了许多大修道院的各式各样的记录,他的《伊尔米农住持的地籍册》(*Polyptique de l'abbé Irminon*)(两卷,1844年)仍然是一部典范著作;这部书包括的时期是811—826年,书中下述小标题就可说明它的内容:“查理曼统治下圣泽芒修道院的庄园、农奴和收入清册。”《地籍册》的序言是“法国学术界一件光荣成就”,和基佐那些讲演一起形成“19世纪前半叶写的研究法国早期情况的最重要的贡献”。革拉尔调查了各阶级的关系、租地的方式以及日耳曼入侵以来各种制度的情况。他驳斥了高卢接受了法兰克侵略者的教化这种说法,并指出,恰恰相反,庄园和行政机构都是罗马的制度。革拉尔出版的修道院记录还有沙脱尔的圣佩尔·兰斯的圣勒密、圣柏丁和马赛圣维克多等修道院的记录。^①

解释这个问题的两个学派,罗马派和日耳曼派就是这样针锋相对,不分胜负,直到1870年以后库朗日才以全力摧毁日耳曼派炮制的早期中世纪史的整个虚构。说来奇怪,库朗日的著作如此离经叛道,关于蛮族入侵的性质他所作结论如此新奇,以致他甚至引起法国学者的反对,在这些法国学者心目中,杜波和孟德斯鸠的名字才是神圣的。

奴马·登尼斯·浮斯退尔·得·库朗日(1830—1889年)^②也

① 《地籍册》的一种新版本,由奥古斯特·隆囊出版(巴黎,1886—1895年,两卷)。参看J. H. 赫塞尔,《伊尔米农的地籍册(811—826年)》和《圣勒密寺院的地籍册》,见《语言学会学报》(伦敦),1899—1902年,第471页以后,第650页以后。关于格拉尔,参看古奇的书,第206—207页;《M. B. 革拉尔写的关于M. 多奴的评论。M. N. 得·惠来所写关于M. 革拉尔的一篇有次序的介绍》(巴黎,1855年)。

② 保罗·吉罗,《浮斯退尔·得·库朗日》(巴黎,1896年),他的学生和朋友的著作;同一作者,《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的历史著作》,见《两世界评论》,第124(接下页)

像和他同时代的芮农^①那样,出身于一个布列塔尼家庭。他在巴

(接上页)卷(1896年),第73—111页。浮斯退尔诞生百年庆典唤起新的估价。J. M. 涂纳-奥蒙,《浮斯退尔·得·库朗日,1830—1889年》(巴黎,1931年)是一部最近的传记,由革拉尔的一位学生写成,此人也在朱里安和摩诺指导下作过研究;此书有一篇谢尼奥布斯(浮斯退尔活着的最年长的学生)写的序。卡密尔·朱理安是浮斯退尔的学术受托人和宠爱的弟子,他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者摘要》(巴黎,1897年)一书中摘录了他的著作,并在一篇精彩的绪论中讨论他的老师,第88—93,101—105,119—123页。普菲斯特尔,布劳赤,格伦尼尔,柏甘牛尔和卡芬雅克的讲话见《法国阿尔萨斯》,第19卷(1930年),第204—216页;第尔、朱里安、格洛茨和普菲斯特尔的言论,见《国际教育评论》,第74卷(1930年),第178—203页;他先前的老师朱理·西蒙有一篇同情他的评论,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8卷(1891年),第33—72页;A. 索列尔的文章,见他的《笔记与肖像》(巴黎,1909年);A. 奥拉尔,《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爱国者,政治家,哲学家》,见《法国革命》,第69卷(1916年),第385—389页;查理·贝蒙的文章,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1卷(1910年),第374—375页;C. V. 朗格卢瓦和谢尼奥布斯,《历史研究绪论》,G. G. 伯利从法文译成英文(伦敦和纽约,1898年),参看索引;马克·布劳赤的文章,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第543页;浮斯退尔著作的评论,见《学者杂者》,1886年,第512—521,595—603,723—730页,1889年,第280—288,329—337页,1890年,第69—83页;佛耳内的文章,见《历史问题评论》,第40卷(1886年),第183—197页;奥利弗·埃尔顿的文章,见《英国历史评论》,第1卷(1886年),第427—444页;H. A. C. 费希尔的文章,见同书,第5卷(1890年),第1—6页;E. R. 金克斯的文章,见同书,第12卷(1897年),第209—224页;加斯顿·道杜的文章,见《历史研究评论》,第100卷(1933年),第41—66页;皮埃尔·加克苏特,《规范》,第8卷(1928年),第258—269页;保罗·维诺格拉多夫,《浮斯退尔·得·库朗日,他的结论和方法》,见《俄罗斯杂谈》(1月,1890年),第2册,第83—103页,参看维诺格拉多夫的《采地的发展》(纽约和伦敦,1911年),第86,109—110页和注释以及他的《英国的农奴制》(牛津,1892年),第17—18,321页;P. 维奥累的文章,见《历史和文学批判杂志》,1886年,第32号;考斯道夫·法尼埃的文章,见《社会改革》,第46卷(1905年),第669—686页;《民族》,“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浮斯退尔”,第81卷(1905年),第93—94页;G. T. 来普斯利,“土地财产的起源”,见《美国历史评论》,第8卷(1902—1903年),第427—428页。对他不利的谈论和批评:C. M. 安得烈,《政治科学季刊》,第六卷(1891年),第734—736页;迦柏列·摩诺的文章,见《历史评论》,第41卷(1889年),第277—285页;同一作者,《肖像和纪念物》(1897年);并参看巴贝·达列维利,《史学家》(巴黎,1888年;19世纪,丛书2,著作和人);保罗·歧尔的文章,见《历史杂志》,第71卷(1893年),第144—151页。

① 本卷原书第586—587页。——译者



黎出生的那年正是七月革命、街头筑垒的时候。他父亲，一位海军军官，早逝之后，这个孩子的教育就由他祖父监管，这个家族的一位友人出钱送他到查理曼高级中学学习。20岁时进了师范学院。基佐的《法国文明史》使他对史学倾心，这个沉默的青年被任命为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他抓住这个机会，以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独自攻读。在他的老师们当中，歇律埃耳^①教给他作学问要准确、要谨防先入之见的习惯；朱理·西蒙^②教他养成哲学的怀疑的习惯，这个习惯后来就成了浮斯退尔最基本的方法。^③

第二帝国^④对高等教育或广泛的研究来说并不是一个顺利的时期。路易·拿破仑政变的政治反响在著名的师范学院的历史上写下最悲惨的一章；教师们被解聘，新任校长对非古典的研究采取压制态度。和别人一样，浮斯退尔也改行研究拉丁文和希腊文，随波逐流地研究起古典时代。他的老师们认为他并非完全响应号召，也不温顺；他的同伙则被那些创见惊呆了。就在那时，浮斯退尔看问题已经和别人不同，当时他就已经热情拥护归纳法，写了一篇文章赞扬培根。泰恩也是在同样的影响下，比浮斯退尔靠后几年在师范学院受教育的。

1853年，浮斯退尔·得·库朗日接受新近成立的雅典法国学

① 法国历史家(1809—1891年)，著有《法国制度历史辞典》(1855年)等书。——译者

② 法国哲学家兼政治家(1814—1896年)，巴黎大学教授(1839年)，法国内阁总理(1876—1877年)。——译者

③ “M. 朱理·西蒙 30 年以前向我讲解笛卡儿的‘讲演法’，从这里产生了我所有的著作：因为我把他灌输到我头脑中的笛卡儿怀疑论用到历史中。”保罗·吉罗所引，见他的传记(见上一个著者注)，第 8—9 页。

④ 1852—1870 年。——译者



校的聘请,为其成员之一,当时这个学校是国外唯一的法国学校。在古典希腊逗留的两年期间,他收集尚未出版的资料,撰写了他第一部书,记述希俄斯岛的一部回忆录(1857 年)。^① 1855 年他被亚眠高级中学聘为历史讲师,在该校暂短停留期间,他写好两篇为取得师范学院博士学位的论文。《波利比阿^②》(Polybe)(1857 年)论述这位希腊历史家关于罗马征服希腊的记载。人们称赞这篇论文渊博、清晰、行文老练,为证明自己的论点选择的那些证据十分恰当。他的论点是:希腊贵族屈服于罗马贵族的统治,可以说是甘心情愿的。他那篇论述女灶神维斯太崇拜^③的拉丁论文说明原来在家里进行的这种祭祀,后来怎样发展成城邦的官方祭典。文章的中心思想,对原始文献的分析,以及其有力的讲解——所有这一切都是他那部即将问世的杰作《古代城市》的先兆。

浮斯退尔在巴黎圣路易高级中学教了两年书之后就被斯特拉斯堡大学聘请担任中世纪和近代史教授。他在该校讲授十年(1860—1870 年),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功。他发现全系教师“有四分之三死气沉沉”,他那些课讲得强劲有力,学术性很高。正如他本人所说,曾引起“人们朴实的振奋”。他提出要“整理全部历史”,并把一百多个学生吸引到自己周围。

以 1862 至 63 年间用的一套讲义为依据的《古代城市》,是 1864 年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写成的。他这部书一出版立即获得

① 收入《科学任务文库》,丛书 1,第 5 册。

② 本书上卷原书第 52—60 页。

③ 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女灶神,相当于希腊的赫斯提。维斯太也是面包作坊主的守护神。——译者



成功而且持续成功,但作者却需自费出版,这事看来未免古怪。^①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各种信念是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创建者。他在《古代城市》的序言中写道:“就人类说,过去的事绝不会全部死亡。人类可以忘掉它,但总是保持着它。因为人本身在各个时代的样子,只不过是过去所有代的产物和缩影。如果他深入到自己的灵魂中观察,就能够在那里重新发现这些不同的时代,并按照每个时代加在自己身上的烙印之不同把它们分辨清楚。”夫累则的《黄金树枝》(*The Golden Bough*)^②是对于这个命题更广泛的解说。浮斯退尔发现在古代,宗教信仰最有力量。他从希腊和罗马家庭起源开始研究,发现家族集团是围绕着对已死的祖先的崇拜建立起来的。在这种对死者的崇拜上边又加上第二种宗教:对自然力的崇拜,这就更适应社会进步。这种崇拜形成一切家族的共有特性,是城市兴起时支配一切的力量,于是统一的信仰取代了分歧。城市仍然以家族为模型;有它自己的炉边、自己的神和自己的祭典。它的法律和制度的根源来自宗教。^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生了其他兴趣,并要求新的法令。一系列革命引起政府和民法的变化;牧师国王让位于寡头统治,后者又让位于民主国家。随着人们眼界扩大,许多地方性的神合在

① 到1890年他去世后,此书已出了13版;英译本出到12版。英译本《古代城市》是威拉德·斯马尔译的(波士顿,1896年)。

② 詹姆士·乔治·夫累则爵士(1854—1940年),苏格兰人类学家;其名著《黄金树枝》是一部研究宗教、神话、仪节等及其在宗教史上重要意义的著作。——译者

③ “曾经产生国家的宗教和抚养宗教的国家,彼此互相支持,并成为一体;这两个紧密结合的权力组成了一个奴役灵魂和肉体的人类权力。”引自吉罗所写的传记(见本书原书第363页著者注),第34—35页。



一起：“各个地方的神的融合在不知不觉中为城市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于是，一个更大的组织的预兆出现了。希腊的世界主义削弱了爱国主义意识，罗马把整个地中海地区据为己有。许多城市屈从于一个城市。然而，随着基督教的到来，在宗教和政府之间打进一个楔子，随着种种旧宗教的毁灭，古代种种制度也随之毁灭。新信仰建立了一个新社会。

《古代城市》一问世就给人以大胆创新的印象。人们在书中可以发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①的文章，^②或米细勒^③那种广阔的历史观的影响的痕迹。浮斯退尔的书也像前一年芮农^④出版的《耶稣传》那样，正赶上人们对宗教史的强烈兴趣的高潮时期。^⑤然而，在他那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中却很少有人了解作者的新方法和意图。浮斯退尔在书中把宗教的作用写得极其突出，因而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一位天主教徒和传教士。路易·梅纳^⑥



① 本书原书第 253—256 页。——译者

② 朱里安在他的《摘要》（见本书原书第 363 页著者注）第 102 页指出，《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开端与浮斯退尔此书绪论的标题有相似之处，标题是“必须研究古人年代最久的信仰，以便懂得他们的制度”。

③ 本书原书第 232—242 页。——译者

④ 本书原书第 586—587 页。——译者

⑤ 这股对宗教史发生的兴趣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德国传到法国，到 1848 年有所增长。亚尔伯特·布洛格里撰写《4 世纪的天主教会和罗马帝国》（巴黎，1860—1866 年，六卷），正统作家贡献颇多，并有另一支转向古代宗教，其中路易·梅纳是阐述异端之美的杰出代表。这两重运动一部分集中在芮农身上，另一部分在浮斯退尔身上，参看朱里安，《摘要》（见本书原书第 363 页著者注），第 90—91 页。

⑥ 法国学者、诗人兼科学家（1822—1901 年），著有《基督教的起源论》（1894 年）。——译者

366 对这部书极其厌恶。^① 他的读者当中那些虔信宗教的人们对他的热情赞扬却使作者困惑不解。^②

他这部书就其写作手法、内容布局和文章风格等方面说,都是一部杰作,后来就成了法国历史著作的典范。不过,针对这部书有两种批评也值得注意。其一是,浮斯退尔这部著作是用先验的概念,用后来他严加斥责的长者的口气写的。这个批评是达尔布瓦·得·朱班维尔^③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④ 为浮斯退尔说句公道话,必须指出,在他这部较早的著作中,他把博学这个包袱隐藏起来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而不是以大量资料为依据、向读者展示作者种种内心活动和疑点以及思想缓慢发展经过的、有着仔细分析的著作。他自己说,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一项研究导致另一项研究,在他意识到这个情况以前,就已经写了 30 来篇文章,全书已经写成了。但浮斯退尔在拿出自己的最后结论时那种透彻清晰,使人们认为他这部“先验史”光彩倍增。

第二种批评,也许是更站得住脚的一种,就是《古代城市》把同

① 阅读爱德华·尚皮翁有趣的小册子,《根据未出版的文献论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巴黎,1903年)。此书主要讨论浮斯退尔和梅纳关于《古代城市》一书的通信,爱好古代异教的人对一个基督徒攻击的想法,以及浮斯退尔对他写此书的目的和方法的自我表白。

② 参看浮斯退尔自己的话,见吉罗的书(见本书原书第 363 页著者注),第 160 页注释;并参看第 32 页。

③ 法国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1827—1910年),1882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译者

④ 亨利·达尔布瓦·得·朱班维尔,《撰写历史著作的两种态度:对玻绪亚,奥古斯丁·提埃里和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的批判》(巴黎,1896年),它包括对浮斯退尔的猛烈攻击。